

钱币

钱屿 钱律一 著

金属货币的诞生
走向统一的先秦圜钱
五铢体制中兴与衰落
收藏与辨伪



出版说明

收藏是人类有目的地、系统地收集、整理、鉴赏、研究人类社会创造的 and 自然界存在的,带有文化价值的物品的活动。而文物收藏更是一项人类高雅进步的、综合性的文化活动。

我国的收藏事业源远流长。自商周便有官方、民间收藏历史文物的活动,到明清,民间收藏之风益盛,收藏的范围也更趋广泛,并出现了许多文物收藏家和鉴赏家。

收藏文物,首先就是收藏了人类的历史;其次,作为一种高回报的投资活动,收藏了优质文物,就等于拥有了一批高成长企业的股票。

文物收藏的功能,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鉴赏之中。鉴赏又可分为鉴与赏:鉴是鉴别藏品的真伪、优劣,这就需要对文物的起源、演进、材质、工艺技法、造型文饰等有一定的了解;赏则是对藏品的把玩、赏析,主要从美学的视角来评价藏品的艺术价值,并结合历史学、民俗学及科技史等深入观察、综合考证。如此,方能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收藏者的难题:避免买到赝品,避免收藏赝品。

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投资理念的扩展和文化精神生活需求的增长,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文物收藏队伍。鉴于此,我们组织了有关文博工作者和文物收藏家,从众多适宜收藏的文物中,遴选了玉器、明清瓷器、铜镜、中国画、俑、钱币、玺印、紫砂等较为常见的8种,每种撰为一册,共8册,作为《文物收藏知识丛书》

的第一批出版。我们力求这批图书对有关的知识介绍得系统全面，文字浅近流畅；每书所附的插图，也力求翔实、精当。

我们期望这几本书的出版，能为初入文物收藏门和有意入文物收藏门的朋友起个架桥铺路的作用；也期望文物收藏界的行家不吝指正，以利我们继续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

编者

1997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货币的起源	(1)
第一节	贝币的流通	(2)
第二节	金属货币的诞生	(3)
第三节	先秦货币的繁荣	(5)
第四节	走向统一的先秦圜钱	(13)
第五节	先秦金银货币	(14)
第二章	秦至隋的货币	(17)
第一节	半两体制	(17)
第二节	五铢体制前期	(22)
第三节	新莽货币改制	(26)
第四节	五铢体制中兴与衰落	(30)
第五节	金银货币	(43)
第三章	唐至元的货币	(46)
第一节	通宝钱制的创立	(46)
第二节	两宋钱制	(57)
第三节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铸币	(67)
第四节	纸币的诞生	(76)
第五节	金银货币的兴盛	(80)
第四章	明清货币	(86)
第一节	明代	(86)
第二节	清代	(93)
第三节	机器制币的崛起	(114)

第五章	收藏与辨伪	(127)
第一节	收藏简史与谱录	(127)
第二节	古钱辨伪	(129)
第三节	古金银币辨伪	(132)
第四节	银铜元辨伪	(135)
第五节	纸币辨伪	(139)

第一章 货币的起源

我国货币起源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历代先贤多有叙述,《管子》、《史记》、《盐铁论》、《汉书》、《说文解字》、《通典》、《通志》、《通考》、《路史》等史籍均有记载。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文献记载有的语焉不详,甚至失之偏颇。目前经过对史料的研究整理,结合考古资料的印证,以及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这一课题有了较为合乎历史真实的结论。

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原始社会初期,生产力低下,人们共同劳动和消费,没有多余产品,也就不存在交换。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有剩余产品的阶段,在氏族以至个人之间就产生了偶然性的交换。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曾经发现过通过交换而来的贝壳。当农业和畜牧业分离的社会大分工发生后,以物易物的范围扩大,出现了一种商品经常地同许多商品相交换的现象,商品价值表现的范围扩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商品交换日益增多,《易·系辞下》中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语。这使生产者逐渐把自己的商品先换成一种大家都可接受而又经常用于交换的商品,然后再换取所需的商品。这种商品起到交换媒介作用,称作“一般等价物”。作为一般等价物有二个决定性的因素。首先是本地产品可以直接转让的有用财物;其次是固定在最重要的外来交换物品上。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生产方式不同,使之各地的一般等价物也不尽统一。北方的游牧民族使用牲畜,农业地区有用家畜,在距今5千年左右的山

东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就发现象征财富的猪头骨。中原地区见有使用来自南方沿海地区的海贝,在山西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过相当数量的海贝。长江下游的农业地区则使用玉器等,良渚文化的墓葬中多次发现有精美的玉琮、玉璧、玉环、玉璜等,应与当地所产的粮食共同作为一般等价物。

商品交换的不断发展,各地的一般等价物逐渐突破地区界限,趋向于统一。趋向统一的一般等价物要具备分合方便、利于携带的特点,在我国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中原及华中地区,贝币占据了重要地位,在我国货币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直至秦统一全国后,才与珠玉龟银锡等不得作为货币流通。

第一节 贝币的流通

海贝作为重要的外来交换品,外形美观,便于计算,成为我国使用最广泛的实物货币,我国发现的贝币种类有:货币(*Monetavia moneta*)(图1)、环纹货贝(*Monetaria annulus*)、拟枣贝(*Erronea erronea*)及大形的阿文绶贝(*Mauritia arabica*)和伶鼬榧螺(*oliva mustelina Lamarck*)。

贝币最早可能出现在夏代,汉桓宽《盐铁论·错币》:“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商代,货贝的作用更大,《尚书·盘庚》:“具乃贝玉。”并已指明贝玉为“货宝”。在甲骨卜辞中,有囚贝、锡贝、取贝等。商代金文中也多有赏贝、锡贝的记载,《中鼎铭》:“侯易中贝三朋,用乍祖癸宝鼎。”考古资料中,在早商遗址中就发现过贝,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第四层出土12枚贝,郑州上街商文化遗址出土有骨贝、石贝等仿贝。郑州白家庄的一座商代前期墓葬中,出土穿孔的贝602枚。1953年在安阳殷墟发掘的83座商代墓葬中,只有234枚贝,出土位置多在人骨架的口中、手足部,有的海贝背部琢孔,便于穿系。

周代,贝币的重要性更为显著,称为贝化。《易经》:“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诗经》:“既见君子,锡我白朋。”西周金文中屡见有锡贝、赏贝、宾贝、用贝等记载。《旅鼎铭》:“公易旅贝十朋,旅用作阼彝。”商代已出现贝的使用单位“朋”,最多见有十朋。西周金文中,有廿朋、卅朋、五十朋,墉方鼎铭、荣殷铭等载有“贝百朋”。一“朋”是几枚贝,主要观点有五贝为朋、两贝为朋。王国维则认为:“殷制五贝为系,二系一朋。”从甲骨文、金文“朋”字作“𠂔”来看,朋是双系贝。迄今的考古资料中,一系贝的枚数各不相同。

陕西、河南、河北、甘肃、宁夏等省区的西周墓葬中都曾发现有贝。海贝作为重要的货币,一直沿用到春秋战国。河南新郑一座春秋墓中出土 317 枚贝,出土位置在墓南端的铜鼎、铜甗内,显然作为殉葬的货币。50 年代,河南辉县固围村一战国墓中也出土过用于财产殉葬的 727 枚贝。

先秦时期,珠、龟、玉等也被作为货币使用过。珠系产自河海江湖的珍珠,其作为贵重的装饰品,本身可作来自外地的货币。龟是龟甲,古人常用于占卜、求神、记载,为人们所珍惜。玉,古人以美石谓之玉,制成琮、璧、环、玦等形制,其中的璧对后世的古钱形制有重大影响。

第二节 金属货币的诞生

商品交换的发展,使一般等价物由某些金属来充当,形成了“货币的价值形态”。在我国,齐家文化已发现有红铜小件。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已出现青铜文化,有中小型的青铜礼器爵、斚、盃等,以及一些青铜质的饰牌、工具和武器等。至商代晚期,青铜冶铸业已相当发达,完全具备了萌生金属铸币的社会条件。

50 年代,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墓葬中先后出土 3 枚铜贝,1 枚长 1.5 厘米,最宽处 1.2 厘米,另 2 枚长 1.7 厘米,最宽处 1.3

厘米。70年代,山西保德林遮峪商代墓葬中发现109枚大铜贝,并与112枚货贝共出。这些无文铜贝值得高度重视,它直接摹仿贝币的形制,显示出由实物货币向金属货币演变的重要环节。周代,这一演变脉络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周代墓葬中也常出现铜贝的踪迹。40年代,河南辉县琉璃阁一座东周墓中,曾出土一千多枚包金铜贝。在河北磁州、河南郑州的两周遗址中也先后出土铜贝。同时,在周代金文中,出现了铜贝的计量单位“𠄎”。“𠄎”周的铜贝演变到战国时期,导致了楚国有文铜贝的产生。

如果说铜贝是金属铸币的发端,那么,另有一个金属铸币的发展脉络则源自于黄河中游的农业地区和黄河下游的渔猎农业区,其由农具和渔猎工具发展而来。商代后期,黄河中游已出现过青铜农具钱镈。50年代,河南洛阳、安阳等地的商代墓葬中曾出土过青铜钱镈(图2),形状似铲。《史记》载有周武王克商时曾“发鹿台之钱,散钅挤之粟。”《说文解字》释:“钱,铈也,古者田器。”段注:“云古田器者,古谓之钱,今则但谓之铈,谓之亩。”而镈,其字在古音韵中与“布”字可同声假借,这和农具剡音近相转为钱字相同。西周时期,出现了原始空首布,介于实用农具与金属货币的中间阶段。春秋时期,生产工具中开始使用铁器,以致青铜器在农业、渔猎生产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有可能转向其它方向发展。有余力演变为货币。

据史籍记载,约在春秋中晚期,经济发达的诸侯国内已可能出现铸币。《国语》载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景王将铸行大钱而被单穆公劝阻一事。《吕氏春秋》载有晋国赵宣孟“与(人)钱百。”《管子》载齐桓公令左司马将白徒而铸钱于庄山。《史记》也载有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经孙叔敖劝罢。就在这一时期,周王畿地区出现了原始布。原始布的形制来源于农具,但已脱离了农具的特征,薄壁无刃,失去了农具的使用性,布身上已有简单的铭文“上”、“山”、“穴”、“益”和“卢氏”等。

第三节 先秦铸币的繁荣

一、空首布

春秋晚期,晋国创铸了耸肩空首布(图3),使先秦货币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耸肩空首布的形制为有𦨇,耸肩、束腰、尖足,方折或弧裆,布身有三直纹或铭文。1957年至1963年,山西侯马牛村晋国古城遗址清理出一处铸造空首布的工场,出土泥布范、范芯多达数十万件,足见其生产规模之大。耸肩空首布的出土地点有山西太原、寿阳、侯马、稷山、运城、翼城、夏县和河南汲县等地。可分大中小三型:大型的通长13.7—14.5厘米,重35.3—37克。大多为素面,少数有简单铭文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二十、上、中九、半、日、工、吕、共、甘、𠂔、甘丹等。中型的通长11.7—12.5厘米,重25.3—30.7克。也以素面为多。侯马晋国遗址曾出土多枚有铭文的,有玄、玄金,□□□黄𦨇、□□□□𦨇。其中的五字空首布虽其铭文尚待进一步考释,但已释读的“𦨇”字表明耸肩空首布确为称量货币。小型的有二种,一种是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出土,长11.7厘米,肩宽4.9厘米,非常轻薄。另有一种是1984年山西榆次出土耸肩异形小布,形制为长𦨇,耸肩,短尖足,方折裆,面有三直纹,通长8.7厘米,带范芯重15克。按照货币轻重规律及器形演变,小型耸肩空首布应是战国时期铸币。

今洛阳地区出土有多批平肩和垂肩空首布。这个地区在春秋早期大部是周王畿之地。西周时王畿之地大抵包括今河南西部、陕西中部。犬戎灭西周后,周王室尽失关中之地,东迁洛阳。据《春秋大事记》载,当时东周疆域为旧河南、怀庆二府之地,兼及汝州,跨黄河南北。及平、恒、庄、惠王(前770—652)时,因恃晋、郑等国抵御狄族入侵,黄河以北地区渐渐并入于晋,而洛阳以东之地则并于

郑国。周王畿所有仅有旧怀庆府河内、武陟二县及旧河南府之洛阳、偃师、巩、嵩、登封、新、宜阳、孟津及旧汝州之伊阳、鲁山，旧许州之临颖县。这正与空首布出土范围相吻合。充分证明平肩、垂肩空首布是周王畿铸币。

平肩空首布有大小二型。大型的形制为长鑿，平肩、弧裆，正面有铭文，背面多为三直纹，通长 8—10 厘米，重 33.1—44 克。大型平肩空首布中有一种 4 字者，铭文为市南小化、市南少化（图 4）、市中小化、市中少化、市左小化、市西小化。背面多有一字铭文：𠂔、丘、以、𠂔、𠂔、正、句、𠂔、同、𠂔、九、𠂔、正、𠂔、余等。“市”应是周王畿商贸集市，平肩空首布的铸造者是市的官吏，以后省略面文四字，仅留原一字背文为志。

公元前 367 年，西周威公去世。公子朝在东部争立，赵、韩两国给予武力支持，遂分裂成西周、东周两小国。东周建都在巩（今河南巩县），前 249 年为秦国所灭。东周建国后，铸行了小型平肩空首布，通长约 7 厘米，重 15—23.3 克，正面有铭文 1 或 2 字（图 5）。

此时，西周国铸行了垂肩空首布。形制为空首短鑿，垂肩，弧尖足，面有二直纹，上有铭文 1 至 3 字，背有三直文。分大小二型。大型通长 7.3—8.1 厘米，重 22—27.1 克。小型通长 7—7.5 厘米，重 18.5—24 克（图 6）。

二、平首铲布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经济交往频繁，各国的商品经济都有较大进步，以致扩大了货币流通数量和流通区域，货币使用者的社会阶层局限性也被突破，一般市民百姓已参与货币经济。这时，各主要诸侯国都先后铸行了本国货币，在形制上以及流通上都带有明显的地区性。在中原地区，出现了平首布。平首布是古钱界的专用名词，是相对空首布的形制而言的。平首布的首部已取消鑿，使其在形制上与原农具完全脱离关系，成为一个象征铲状的铜片，只

能用于货币流通。平首布按形制特征、铸造国别可分铲布、尖足布、圆足布、三孔布、方足布等。

铲布形制为平首，圆肩，桥裆，方足，正面模铸地名及铲、𠄎等计量单位铭文，或仅有地名，背大多平素。铲布大小不一，有分为半铲、一铲、二铲的三等制，也有以多少枚当一𠄎的。最大的通长 6.5 厘米，重 29.4 克。最小的通长 2.5 厘米，重 7 克。

铲布主要是公元前 4 世纪中叶魏国所铸行的。铲布中有安邑二铲(图 7)、安邑一铲、安邑丰铲。安邑是魏国城邑，地望今山西夏县西北 15 里。《史记·秦本记》：“魏自魏绛徙此，武侯二年(前 394)城之。”《史记·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前 339)，“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铲布中有四种梁铲布系迁都大梁后铸行的。铲布中又有三种阴晋布，阴晋系魏邑，地望今陕西华阴，《史记》：秦惠文王六年(前 332)，“魏纳阴晋，阴晋更名宁秦。故阴晋布系此之前铸行。图 8 为“晋阳一铲”。

三、圆足布

战国中期，赵国铸造发行了圆足布。圆足布有大小二等，大者重 14—16 克，小者重 7—9 克，与魏铲布中的一铲、半铲布相近。圆足布的形制为圆首，圆肩，圆足，正面有铭文“𠄎(离)”(图 9)或“离石”，背面多有数词，从一至八十九。𠄎的地望在今山西离石以西，战国前期系赵邑，与魏国相邻。离石的地望在今山西离石境内，赵邑。魏惠王十七年(前 353)，秦夺取魏国少梁后，𠄎成为秦赵边境城市，该地区一直是秦赵两国攻防重地。越惠文王十七年(前 282)，被秦所占领，圆足布也停铸。

公元前 296 年赵灭中山国后，铸造了三孔布。三孔布分大小二等，形制为圆首，圆肩，圆足，首与双足各有一穿，正面有地名铭文，背面首部有纪数，下有纪值“两”或“十二朱”。公元前 234—238 年，秦国攻占了赵国的部分地区，该地区相当今河北石家庄地区，

正是流通三孔布的中心地域，三孔布随即停铸。三孔布仅铸行 60 余年，流通地区为北至今内蒙包头，南至河南内黄，西至山西屯留，东至山东禹城，故存世数量较少。现国内计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数枚，天津历史博物馆 3 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2 枚，国外主要是日本东京银行藏有 20 余枚。

图 10 为分布于河北蔚县东的三孔布，图 11 为分布于山西平定东南的三孔布。

四、尖足布

韩赵魏三家分晋后，赵国继承了晋国的货币文化，从耸肩尖足空首布中衍变成赵国的耸肩尖足平首布，人亦称“尖足布”。前期尖足布分成大小二等，大布重 10.1—12.6 克，小布重 4.5—6.5 克。正面有地名币文，背面多有纪数。这些地名有冈（图 12）、兹氏、大阴（图 13）、邪、榆次、甘丹、晋阳、易曲、肤虎等。晋阳，赵国早期都城。甘丹即邯郸，春秋晋邑，战国时赵肃侯建都于邯郸。兹氏，春秋地名瓜衍，战国入赵易名兹氏，其余地名也均为赵邑。后期只铸行小尖足布，重 3.5—6.5 克，有 20 余种地名，逐渐从中演变出少量类方足布、类圆足布（图 14），成为向方足布、圆足布转变的中间阶段代表。

五、方足布

战国中晚期，韩、赵、魏、燕、东周等诸侯国都铸造和流通方足布。方足布的形制为平首，平肩，束腰，方足，因此而得其名。存世方足布中有几种重 8.5—13.5 克的大方足布。戈邑布，背铭“一半”，春秋时戈国地处宋、郑两国之间，战国时属魏，地望今河南杞县。梁邑布，地望今河南开封，魏国都城，铸造上限为公元前 339 年。安阳布中有重 10.5—14 克的，铸地应为魏安阳，地望今河南安阳。以后，赵国开始大量铸造重 5—6 克的小方足布，韩国也紧随其

后。小方足布的铸行下限是战国末期，东周国起初铸行空首布，在周围国家影响之下，也铸造少量方足布“东周”、“成邑”等。因其公元前 249 年被灭，故可知小方足布流通、铸造下限。现辨别小方足布的国别，主要依据币文地名。

图 15 为“中都”方足布。

六、楚布

楚国曾铸有大小二等平首布，在安徽、江苏、山东、浙江等地都曾出土。大布形制为平首上一圆穿，平肩，束腰，长方足，通长约 10.5 厘米，重 28—37 克。也有减重至 17 克左右的。大布正面币文“桡比(币)当折”，背文“十货”。正面币文的释读历来有分歧，有释“扶耄当折”、“施钱当折”等。小布形制同大布，通长约 4 厘米，重 7.5 克左右，面背币文“四比(币)当折。”小布往往两枚足部相连，人称连布。

河南新郑市郊郑韩故城遗址曾出土多方桡比当折、四比当折陶范，为这二种布币的始铸年代提供了线索。韩国原都平阳，哀侯二年(前 375)灭郑后迁都南郑，地望即今河南新郑。据此西南 30 里为楚国北塞“陘山”，楚韩两国多次在此发生战争。可见，楚国是受中原货币影响以后始铸二种布币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375 年左右。

七、齐刀

刀币是从手工业工具刀削演变而来的。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最早开始铸行，燕、赵两国先后在其影响下也开始铸造，在今华北地区形成一个刀币流通区域。

最早的刀币现有二件残品。1930 年，山东章邱出土一枚“莒邦”残刀首，为天津藏家方若所得，现藏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1962 年，陕西咸阳秦国遗址发现一枚残刀头，残存一个币文，有释“阿”

字，现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莒国是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建都介根，春秋初年迁于莒（今山东莒县）。公元前 431 年为楚所灭。齐宣公四十四年（前 412）齐伐莒，莒地可能该时入齐。在此之后，才铸莒邦刀，阿刀的铸行时间大约与此相同。

齐刀有 6 种：齐之大刀（四字刀）、安阳之大刀（安阳五字刀）、节墨之大刀（节墨五字刀）（图 16）、齐返邦张大刀（图 17，六字刀）、即墨大刀（即墨四字小刀）、齐大刀（三字刀）。形制为削状，正面有 3 至 6 字币文，背面有 1 至 2 字币文。

图 18 为背文“莒治齐刀”的齐刀。

在形制上，齐之大化、安阳之大化、节墨之大化的内缘与刀柄直文直平，外缘凸起，高于直文，三者属一种类型。在考古资料中，出土较少，且常有同出。因此，这三种齐刀的铸行年代相近。即墨（节墨），地望今山东平度县东南，原为莱国棠地，鲁襄公六年（前 567）齐侯灭莱，改名即墨，成为与临淄齐名的重邑。安阳，史载临近莒地，地望在今山东半岛东部。前 412 年齐伐鲁、莒及安阳后，安阳入齐。前述在此之后铸莒邦刀。周安王十一年（前 391），田氏代齐，前 386 年，周安王承认田和为齐侯。这时田齐铸行节墨之大刀，背文中有开封、安邦、大昌、大行、吉等纪念内容铭文。而齐之大刀、安阳之大刀与节墨之大刀不仅形制特征上有相同处，正面币文中都有介词“之”，背文中也有 5 至 7 种相同。它们的铸造时间应接近。

燕昭王二十八年（前 284），各国联合攻齐。燕将乐毅“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在长达 5 年的围困战中，齐国铸造了节墨大刀和莒易刀。节墨大刀制作粗糙，短小，质轻，一般重 33—45.5 克，个别仅重 23—29 克。解放以来，仅见山东高青县高城镇于 1980 年春出土 5 枚，可知存世较少。

清朝嘉庆年间，山东博山香峪村出土一批齐易刀，又称博山刀、齐明刀、谭明刀。其特征形制如燕刀，刀身圆折，正面有“易”，文字结构方折，背面有多字币文，第一字为“莒”。通长约 14 厘米，重

11.9—19.2 克。

1979 年，莒县莒故城遗址出土一方齐易刀陶范，可证实齐易刀铸地为莒故城。另有平度市博物馆藏有一方齐易刀正面残范，据说出土于即墨故城。可知当时即墨也铸齐易刀。仅铸数年，故存世较罕见。

公元前 279 年，齐安平君田单右即墨以火牛阵攻破燕军，收复失地，将齐襄王从莒迎入临淄。齐国铸行齐返邦长大刀，返邦长系齐襄王自称邦，《周礼》注：“大曰邦，小曰国。”长，《吕氏春秋》注：“长，君也。”《周礼》注：“长，诸侯也。”

此后，在齐都临淄铸造齐大刀（图 19）。齐临淄故城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该遗址曾发现齐大刀铸钱遗址，出土大量齐大刀范。另在大佛寺旧址也有出土齐大刀范。除此，山东益都、福山出土过几块。说明齐大刀的铸造权是掌握在官府手中的。齐大刀陶范全长 27 厘米以上，宽约 13 厘米，范面并列有 3 枚币型，背面有指印抠手。

八、燕刀

战国时期，燕国铸行了 3 种刀币。最初铸尖首刀，始铸于公元前 4 世纪。尖首刀有二类。一类是刀身较长，重约 17—20 克，大多为素面。另一类刀身略短，重 15—17 克，有一字铭文，内容为数词、干支、名物。

针首刀以刀尖细长而命名，通长 13.8—15 厘米，重 14.7—16.5 克（图 20）。出土极少，出土地区为河北张家口、承德及辽东等地，是燕国的一种地方货币。正面多有一字铭文。

易刀，旧称明刀，缘起于刀币正面一字铭文。该字有释莒、同、盟、召、泉、匱等。此字结构由日、月组成，《说文解字》：“易蜥易蜥蜴，守宫也。象形。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公元前 361—333 年，燕文公自燕迁都于易，地望今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水经注》：

“东遼易县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燕易王十年（前323），燕易王称王，始铸易刀。易刀的发展有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易刀形制为刀身圆折，弧背弧刃，正面铭文“易”字与晚期尖首刀相似，背文文字多单字，重16—19克（图21）。中期易刀的形制仍为圆折刀身，刀身略短，正面铭文“易”字呈圆形过渡状，背文有1至2字，重14—17克。晚期易刀形制为刀身磬折，即刀背与柄部交接处呈方折形，正面铭文易字呈眼睛状，背文有1至4字，左、右、中外加数字或其它文字。

九、赵刀

战国时期，赵国受齐、燕货币影响，也铸行刀币。赵刀形制为圆首，直身，故称“直刀”、“圆首刀”，正面有2至3字铭文，多为纪地，背有1至2字背文，通长14厘米左右，重7.4—11.9克，个别重达16.1克。

图22为铭文“甘丹”的赵刀。

甘丹是赵国都城邯郸的省文，地望今河北省邯郸市郊。白人则是赵邑柏人的省文，地望今河北临城东南，而白刀、城白即白人刀、白人城。

十、楚贝

楚贝的形制继承了商至战国青铜仿贝的传统，其在宋代被称为蚁鼻钱，清代古钱家则称之为鬼脸钱。它的出土范围相当广泛，在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均有发现，大致为战国时期楚境。在安徽、上海、湖北等地的博物馆、文物商店均藏有楚贝铜范。

楚贝的形制为平背，正面有一圆穿及一字铭文，通长1—2厘米，重1—5.5克，个别有长4厘米，重8克。青铜质。

币文中，𠂔、𠂔是楚衡制中的计量单位。一般以贝、𠂔为常见，